

# 试析《申报年鉴》(1933—1936)的影响

孙兴武\*

**摘要** 1933年,为庆祝《申报》创刊60周年,申报馆发行《申报年鉴》。该年鉴汇集各方智慧与心血,不仅包括“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事政治,也刊载国内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他国概况。至1936年,申报馆共连续出版4次《申报年鉴》(张梓生均担任主编),总计1000多万字。《申报年鉴》的问世,在当时以及对当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申报年鉴》 影响 张梓生

1932年,申报馆以《申报》创刊60周年为契机,于当年11月30日发布《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拟定12项“努力计划”,其中第11项郑重声明:“《申报年鉴》正在编印中”<sup>①</sup>。1933年,首部《申报年鉴》诞生。至1936年,申报馆共连续发行4次《申报年鉴》<sup>②</sup>。目前,学术界对《申报年鉴》鲜有关注,<sup>③</sup>与此有关的文章大多停留于简单分析或介绍层面,遑论对年鉴影响的详细探讨。因此,本文将结合相关资料,试对《申报年鉴》(1933—1936)的影响作一分析。

---

\* 孙兴武,男,江苏省扬州市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① 《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纪念本报六十周年》,《申报》1932年11月30日第2张第6版。

② 民国时期,《申报年鉴》共计发行5次(1933—1936、1944);本文不论析1944年在日伪控制下由陈彬龢主编的《申报年鉴》。

③ 目前,关于《申报年鉴》的研究主要有:(1)白翔《〈申报年鉴〉的价值与局限性》(《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着重阐释了《申报年鉴》具有“写真程度超过陈史”“努力于学术文化之灌输”等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性;(2)肖边在与《申报年鉴》同名的期刊论文(《年鉴信息与研究》1996年第2期)中,简单介绍了1933年《申报年鉴》的部分序言、编例和内容分类等情况;(3)傅德华、于翠艳撰写的《〈申报年鉴〉的历史文献价值》(《中国索引》2013年第1期)将该年鉴的特点概括为详细、准确和完整;(4)任晓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报人史量才的公共交往研究——以其主持〈申报〉时期的报刊活动为中心》(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系,2017年)中简要分析了张梓生主编的《申报年鉴》,提出该年鉴是史量才公共交往的呈现;(5)在研究《申报》或回忆近代上海文坛的书籍中,如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都多少提到该年鉴,以及顾国华所编《文坛杂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中何济翔非常简短地回忆了张梓生编辑《申报年鉴》时的情况。

## 一、《申报年鉴》当时影响

1932年7月,申报年鉴社在向全国征求年鉴材料的《启事》中写道:“敬求全国公私各机关赐予有力之援助,将各种调查统计见寄,或于敝社通函奉询时,予以详明之答复,或于敝社采访员趋前接洽时,予以適切之指示,则感激受惠者不仅敝社已也。”<sup>①</sup>该年鉴于1933年起发行4年,对主编张梓生、读者以及申报馆等相关各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感激受惠者”确如《启事》所述,超越了年鉴编辑部门。

### (一)对张梓生:兼顾工作与兴趣,提升基础与经验

距第一部《申报年鉴》出版近两年,主编张梓生在《东方杂志》“生活之一页”专栏撰文,以《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为题回顾了编写该部年鉴时的生活。

在评价已有的十多年编辑经历“埋送于每日在编译室做急就工作的,约居十分七;虚靡于写若干字换若干钱的,居十分之三”<sup>②</sup>后,张梓生自忖:“倘使‘苦中亦有乐趣’的话,有人相信,那末,我的编辑《二十二年申报年鉴》的一时期,差可称为个人近年来有兴趣的生活了。”<sup>③</sup>

“有兴趣的生活”能够实现,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一·二八”事变后家眷回绍,只身一人在沪的张梓生并无太多家庭负担,能专心于编辑;二是年鉴草创期间,无需服从“到点下班”的规定,能依不时涌出的构想自在工作。<sup>④</sup>

于是,张梓生在劳苦工作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兴趣,有幸将编辑工作与个人爱好相结合。

#### (一)自茫无头绪至草成样册:

……这工作的进行,不能说是不苦,但一到商讨有结果,修改有进步,接到各专家复函或赞成原稿或开示修正稿的时候,则各有一种兴趣。

#### (二)自材料征集至稿件发排:

……这劳苦工作的过程中,身心都会感到疲倦,但一看到平常所不曾见过的,我所惧怕不易得到的材料,纷陈案头,同事商量争论自己认为差可成书而发排的时候,又各有一种兴趣。

#### (三)自校样见面至全书告成:

……晓得较新的确是没有,所缺的抄录到了。抵触的是各有是处而不必强求一致,那时,便释然如释重负而发生兴趣了。<sup>⑤</sup>

“自茫无头绪至草成样册”是从宏观角度看待1933年《申报年鉴》,“自材料征集至稿

① 《申报年鉴社征求材料启事》,《申报》1932年7月14日第1张第3版。

② 张梓生:《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

③ 张梓生:《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

④ 张梓生:《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

⑤ 张梓生:《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

件发排”“自校样见面至全书告成”是从材料搜集整理的微观视角,均体现了个中辛苦与乐趣。换言之,上述三方面可谓年鉴编写三阶段,这与王国维《人间词话》所提“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sup>①</sup>有着相似之处。

“自茫无头绪至草成样册”,对应“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年鉴初创,纲要如何制定、门类如何安排,毫无经验。年鉴出版目标已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讨论、征询中求得“有结果”“有进步”,编成样册。

“自材料征集至稿件发排”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相应。年鉴编撰,并非仅有编辑之力,也需各界帮助。依据拟定的纲要,向各方征求材料,需要什么材料、向什么单位搜集、材料能否找到等,都是编辑尤其主编秉持锲而不舍的态度为稿件发排在勤奋工作时思考的。

“自校样见面至全书告成”,蕴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道理。校样形成后,发现材料可能过时、缺漏或相左。经又一番征求意见,方知材料较新没有、所缺已录、抵触不必一致,整部年鉴终于完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欢乐便洋溢开来。

年鉴编写或许称不上“大事业、大学问”,这“三阶段”却是“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工作的缩影。从确立目标、勤恳编辑直至收获成果,工作中亦有兴趣。

1933年《申报年鉴》的编辑“苦中亦有乐趣”,同时在无形中为张梓生以后的编辑工作做好了主观条件的铺垫。

就1934—1936年的《申报年鉴》而言,已有第一年出版经历的张梓生驾轻就熟,尽管其自谦“余以《申报年鉴》主编之人,不敢于此自夸其成绩,且两次年鉴之成,多应归功于供给材参与编稿之热心掖助诸君”<sup>②</sup>。例如,1935年公布的年鉴编辑方针与《劳苦工作即兴趣工作》提及兴趣之所在时反映的工作目标是一脉相承、更趋完备的。

(一)集编范围广泛之材料,以适应各界参考目的不同者之检查。(二)聚汇各专家之所贡献,分工合作,整理各种具有专门性质之材料,以求内容之日趋精确。(三)谋购备诸君实用上之便利,全部材料之分列于各门类,其适当与否,经社内同人之再四斟酌,觉尚有未妥,则分函请教于专门家及相知之备用《申报年鉴》诸君;务求各界人士,欲检某项材料时,能以较少时间翻阅可得。<sup>③</sup>

张梓生和年鉴社同人确定了当年工作的着力点为求新、求精、求确<sup>④</sup>,有效地与编辑方针相契合。

此外,据现有史料,就其他类似刊物来说,1933年11月<sup>⑤</sup>出版的《民国二十二年编〈上

① 王国维著,黄霖、周兴陆导读:《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② 张梓生:《民国二十四年之〈申报年鉴〉》,《申报》1935年1月1日第1张第4版。

③ 张梓生:《民国二十四年之〈申报年鉴〉》,《申报》1935年1月1日第1张第4版。

④ 张梓生:《民国二十四年之〈申报年鉴〉》,《申报》1935年1月1日第1张第4版。

⑤ 上海市地方协会编:《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计〉》,上海市地方协会,1933年,版权页。

海市统计》》，邀请张梓生担任土地、人口部分的“指导者”<sup>①</sup>，对机关和个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订。<sup>②</sup>

无论是编写、改进其余3年《申报年鉴》，还是参与指导《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计〉》，都与张梓生主编首部《申报年鉴》所获得的经验有着莫大的联系。1933年《申报年鉴》的成功发行，又和张氏将工作与兴趣相兼顾密不可分。

## (二)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将1900—1950年划分为“知识危机”阶段，<sup>③</sup>其论述主要围绕学科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知识带来的影响。若以“知识危机”的字面义，反观1930年代中期及之前的上海：商业贸易兴盛、工业生产发达、社会团体活跃、民众生活多样，一切似乎都瞬息万变——使身处其间的人们陷于知识危机，需要掌握新的知识以应对外界的变化。不仅是沪上，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因时代的发展而面临不同程度的知识危机。《申报年鉴》的诞生，呼应了这一社会客观现实。

1933年《申报年鉴》印行，张梓生于《编者序》中写道：

在前代，智识是士大夫阶级的专有品，只有秀才，才能知“天下事”。可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同了。智识成为大众的生活必需品。现代一个良好的公民，都必须了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军事的常识，都必须明了本国和世界大势。不论是一个农民、商人、工人、学生、生产者或消费者，要是对于现代的一切活动，没有相当的认识，连个人生活，都会感到许多困难，更不必说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了。<sup>④</sup>

从“专有品”到“必需品”，道出了各时代对知识（智识）普及程度的不同要求——“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对个人生活愈发重要，“现代的一切活动”离不开知识的储备。张梓生开宗明义，从主编角度谈及《申报年鉴》是申报馆为传播现代生活知识而做的努力。一定条件下，对现代生活知识的广布既是该年鉴刊行的初衷，也是它希望企及的影响。

1932年，第一部《申报年鉴》尚在预约之际，年鉴社就表达了对年鉴影响的畅想：“得《申报年鉴》一册，胜购寻常参考书数十种，凡国民常识所需要者、凡普通人所应知悉者、凡一切活动之知识，《申报年鉴》中无所不有。”<sup>⑤</sup>进入1933年，类似广告时常在《申报》上出现，贯穿全年。广告所言，一册年鉴抵数十种参考书、各种知识应有尽有，冲击着报纸读者的视线，体现了年鉴在当时的一种影响。参考书是不必仔细阅读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从中找到特殊的信息，它是通往知识殿堂的“后门”、一条获取知识的捷径。<sup>⑥</sup>

① 上海市地方协会编：《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计〉》，第3页。

② 在相应的出版广告中，张梓生被列入审订者，参见《申报》1933年11月25日第1张第4版。

③ [英]彼得·伯克著，汪一帆、赵博因译：《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8页。

④ 张梓生：《编者序》，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15页。

⑤ 《申报》1932年11月28日第4张第15版。

⑥ [英]彼得·伯克著，陈志宏、王婉旒译：《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5页。

《申报年鉴》就是这样的参考书,读者通过检索年鉴目录,能够快速获取对他们有用的知识。“我国民既不能弃现有职业而就高深学问,两全之策,惟有开快车,抄直径。购读最近出版之《申报年鉴》,诸事无不倡晓。”<sup>①</sup>

与现代生活相对,则是原始古老、愚昧闭塞的生活,其间的人们不需要“开快车”“抄直径”地获得知识,何况知识又或许被类似于士大夫阶层的人士所垄断。减少愚昧闭塞的思想是普及现代生活知识后必然达到的一个目标和影响,是《申报年鉴》发刊时的期望:“愚昧是民族的最大弱点。《申报年鉴》的发行,要是在增加国民认识这一点上,对于抗日反帝的工作,有些微的效劳,这是同人们最大的期望了!”<sup>②</sup>而知识“往往被视作经济、社会……改革的辅助物”<sup>③</sup>;向现代化步履蹒跚迈进的中国呈现《申报年鉴》,对读者来说是少愚昧、增“现代”,实际也是申报馆和申报年鉴社为那个内忧外患的变革年代添加的注脚。

### (三)对申报馆:丰富报馆出版物,扩大《申报》影响力

申报馆业务广泛,在经营《申报》之时,图书、期刊等领域也有很大建树,“印行之书每月不下三四部”<sup>④</sup>，“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已发展成为上海较完备的新闻出版中心”<sup>⑤</sup>。因而,本部分标题中“报馆出版物”,指申报馆及其附属机构(申昌书局、点石斋印书局、图书集成印书局、集成图书公司等)<sup>⑥</sup>所发行的各类出版物。结合现有资料,选取《申报年鉴》创刊前申报馆发行的部分出版物,列表如下:

表1 1872—1932年申报馆各类出版物管窥<sup>⑦</sup>

序号	首次出版年份	名称
1	1872	《申报》
2	1872	《瀛寰琐记》
3	1873	《文苑菁华》
4	1874	《儒林外史》
5	1875	《四溟琐记》
6	1875	《遁窟谰言》
7	1875	《快心编》
8	1877	《寰瀛画报》

① 《申报》1934年5月18日第6张第22版。

②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1册,第16页。

③ [英]彼得·伯克著,汪一帆、赵博因译:《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第288页。

④ 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⑤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⑥ 上海图书馆编:《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2页。

⑦ 表1由笔者根据《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第226—281页的内容选取主要部分归纳而成,未囊括年份范围内全部出版物,故名“各类出版物管窥”。

(续表)

序号	首次出版年份	名称
9	1887	《古今图书集成》(仿印)
10	1919	《申报星期增刊》
11	1920	《常识》
12	1921	《申报汽车增刊》
13	1922	《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
14	1923	《教育与人生》
15	1924	《本埠增刊》
16	1930	《申报图画周刊》
17	1932	《申报月刊》
18	1932	《淞沪血战回忆录》

从上表可知,1872—1932年,申报馆出版物种类繁多,可细分为报纸、图书、期刊3种。除《申报》为报纸类以外,如《文苑菁华》《儒林外史》等为图书类,《教育与人生》《申报月刊》等属于期刊类。这些出版物主题多样,涉及笔记小说、回忆录、文学、教育等,更有当时全国报纸绝无仅有、主要是为汽车推销商服务的《申报汽车增刊》。<sup>①</sup>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申报》发行量已至14.8万份,<sup>②</sup>其中外埠发行约八九万份。<sup>③</sup>如此可观的发行量,离不开申报馆各类出版物对读者的吸引力。《申报》读者众多,阶层不一,兴趣各异。每个出版物的发行满足了目标读者的期望,“捕获”了他们的目光。相对照的是,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有一统计:1934—1936年,上海仅商务、中华、世界三家大书局的新出版物册数平均每年占据同期全国出版物的65%,其中商务印书馆即覆盖48%。<sup>④</sup>而以《申报》60周年为契机,于1933年创刊、发行4年的《申报年鉴》,是办报人重视当下社会状况的职业性延伸,<sup>⑤</sup>它承接了满足读者需求这一目标,是报馆出版物名录中的新成员。它与《申报丛书》《中国分省新图》等新出版物一道融入史量才的“大出版观”,为《申报》和申报馆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新闻出版业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二、《申报年鉴》当今影响

1933—1936年的《申报年鉴》,彼时作为国人现代化生活之参考,如今则是学术研究

① 上海图书馆编:《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第271页。

②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0页。

③ 宋军:《申报的兴衰》,第157页。

④ 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37、338页。

⑤ 黄显功:《申报馆出版物的时代特点》,收入邵雍等著:《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的史料和编辑思想的体现。

### (一) 蕴含众多史料,助推学术研究

《申报年鉴》(1933—1936)分为土地、人口、立法、国防、学术、交通等部分,涉及领域广泛,记录了1932—1935年此4年间的一些情况,为后人了解并研究那时的中国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为例。在该网站“高级检索”页面以“被引文献”为唯一检索条件、以“申报年鉴”为条件内容精确搜索13个数据库后发现:截至2019年3月31日,共计860篇知网所收文献将《申报年鉴》作为参考文献之一。<sup>①</sup>虽然此搜索结果难以排除1944年的《申报年鉴》,但这一检索结果仍反映出1933—1936年《申报年鉴》对当下学术研究的助力。

比如,冯筱才《科学管理、劳资冲突与企业制度选择——以1930年代美亚织绸厂为个案》,通过参引1935年《申报年鉴》所载1934年上海绸厂1万元以上产值者中美亚居首位,指出“到1930年代初,该厂便成为业内之巨擘”<sup>②</sup>。

又如,李慧《中国红十字会参与疫病防治的历史考察——以1912—1937年华东地区为中心》,文章借1936年《申报年鉴》所记1934年全国医师、药师的人数,论证“医疗卫生事业的滞后,带来疫病防治工作的落后”<sup>③</sup>等观点。

引用《申报年鉴》(1933—1936)的文献,与年鉴本身的包罗万象相似,仅2018年就涉及经济、教育、医疗、灾荒、军事等各类主题,其他年份也概莫能外。

但是,“860篇”的被引量仍有提高之处,才可与年鉴的价值相匹配。文海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等机构相继影印出版的《申报年鉴》<sup>④</sup>,已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纸质版的价格、体量却容易成为查阅时的阻碍。今后如果该年鉴在线检索系统出现,这一局面将被有效地改变。

### (二) 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

以张梓生为主的《申报年鉴》编辑已将他们的考量与年鉴编写融为一体,反映的编辑思想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年鉴编写的开放性。年鉴内容庞杂,尤需集思广益而非闭门造车,延揽专家学者共同编撰方能保证年鉴的准确。以1935年材料供给者为例。

① 说明:(1)为稳妥起见,跨库选择时勾选了中国知网所含全部数据库,共计13个;(2)由于无法在搜索时更加细致地区分1933—1936年《申报年鉴》和1944年《申报年鉴》,故只能以“申报年鉴”(无引号、书名为)为检索内容,导致检索结果中确有一部分只是将1944年《申报年鉴》作为参考文献,如朱叶《国民政府对汪伪“和平运动”的广播战》(《学术交流》2017年第12期)一文引用了1944年《申报年鉴》的内容。

② 冯筱才:《科学管理、劳资冲突与企业制度选择——以1930年代美亚织绸厂为个案》,《史林》2013年第6期。

③ 李慧:《中国红十字会参与疫病防治的历史考察——以1912—1937年华东地区为中心》,苏州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2页。

④ 1973年,文海出版社仅影印出版1935年《申报年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分别于2010年、2012年影印出版全套《申报年鉴》(1933—1936、1944)。

表2 1935年《申报年鉴》材料供给者<sup>①</sup>

翁文灏(土地)	曾世英(土地)
欧阳纓(土地)	余青松(天文)
竺可桢(气象)	龙相齐(Ernest Gherzi, S. J.)(气象)
刘燧元(内政)	曾养甫(建设)
秦景阳(建设)	赵鸣九(考试)
谢冠生(司法)	戴铭礼(财政)
章乃器(金融)	刘大钧(工业)
陈仲裁(工业)	周启刚(侨况)
蔡元培(学术)	丁文江(学术)
舒新城(出版)	金宝善(卫生)

按:单元格括号内为供给材料所属类别。

从中可见翁文灏、竺可桢、章乃器、蔡元培、丁文江和舒新城等知名人士参与其中,这进一步提升了年鉴内容的可信度,折射出申报馆和申报年鉴社的影响力。

“开放性”的另一含义,是编者欢迎并有勇气直面各种意见与批评。首部年鉴出版后,年鉴社在《申报》刊登广告《〈申报年鉴〉征求校订及批评》,“普求各专家及读者通函批评,及将看出之错误告知云”<sup>②</sup>,表明了年鉴编者坦诚的态度。同年和次年,千家驹分别在《图书评论》和《独立评论》发表对相应年份《申报年鉴》的评价,<sup>③</sup>有肯定、有批评,而年鉴社的回应可从1936年千家驹致信胡适时略知一二:“我评过《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及二十二年之《申报年鉴》。他们的编者无不专函表示谢忱,且于改编时(如《浙江实业志》及二十三年之《年鉴》)在编制上竟完全接受我的意见。”<sup>④</sup>专函答谢、完全采纳意见,让千家驹印象深刻,这是年鉴编写开放性带来的魄力。

第二,年鉴编写的时代性。年鉴一般是对上年情况的汇总整理,时代特征鲜明。如何在选取材料时更好地与时俱进,是一个命题式的挑战。其中有四次《申报年鉴》都将上一年国内重要大事置于年鉴之首,1933年是“一年来之国难”<sup>⑤</sup>,其余3年依次是“东北在中国之地位”<sup>⑥</sup>(1934)、“纪念史量才先生”<sup>⑦</sup>(1935)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

①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6册,第187页。

② 《〈申报年鉴〉征求校订及批评》,《申报》1933年8月1日第5张第19版。

③ 分别是:(1)千家驹:《〈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二年)》,《图书评论》1933年第1卷第12期;(2)千家驹:《〈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三年)(书报介绍)》,《独立评论》1934年第102号。

④ 千家驹:《千家驹致胡适》(1936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6页。

⑤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1册,第31—73页。

⑥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3册,第377—380页。

⑦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6册,第181—183页。

举法》等<sup>①</sup>(1936)。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表明编辑同人与国人一道因日本侵略东北而产生的同仇敌忾之情,另一方面则是从年鉴社集体角度出发对所属报馆变故、对国家发展的关心,很好地诠释了“时代性”。

第三,“对张梓生:兼顾工作与兴趣,提升基础与经验”间接说明年鉴编写需要认真的态度。在编撰年鉴过程中,编者能品尝到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应始终保持谨慎仔细的态度以确保年鉴质量。

最终,第一至第三方面在本质上都围绕“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年鉴编写应时刻以读者为中心。《申报年鉴》的撰写及出版,首要目的是服务读者:“凡国民常识所需要者、凡普通人所应知悉者、凡一切活动之知识,《申报年鉴》中无所不有。”年鉴为他们带来现代化的知识,使其更快更好地参与现代日常事务。

上述是《申报年鉴》(1933—1936)蕴含的编辑思想。由“鉴”观“志”:当前,我国正处于第二轮修志的收尾阶段——截至2015年,首轮修志结束,第二轮修志进入关键时期,全国已出版7000多部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2020年,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将全面完成。<sup>②</sup>

虽然年鉴不同于方志,仅编撰材料选取的时间长度即是一个明显的差异。年鉴是以一年为限,方志是以几年至几十年不等、相对更长时间为限,各自呈现编撰对象在特定时期内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年鉴可视作每年一出的方志,方志则类似多期年鉴的整合版。因此,基于年鉴与方志的相似性,了解《申报年鉴》(1933—1936)编者的所思所想,将有助于当前第二轮修志工作的推进与完善。

### 三、结语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申报馆编写年鉴如是评价:“一家私营报馆不惜耗费资金和人力,编制社会年鉴,实属有远见的文化建设。”<sup>③</sup>正因为是“有远见的文化建设”,年鉴的发行从当时而言,“编者”“受众”和“出版机构”所受影响虽然不同,却能归结为都受惠于《申报年鉴》的出版。而“远见”所及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该年鉴仍是学术研究的史料来源、方志修撰的有益借鉴,是前人为今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与此同时,上文“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所述编辑思想,既有利于方志编修,也是当今年鉴编写应参照的标杆。

首先,年鉴编写的开放性呼唤“开门编年鉴”。《申报年鉴》的成功出版离不开各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也离不开申报年鉴社勇于接受批评的态度和勇气。反观当下,以地级市年鉴为例,虽有各方的共同努力,如专业性的回顾通常由各单位供稿,但在出版后缺乏类似《申报年鉴》借助报刊广告征求意见的举措,不利于年鉴内容的逐步完善。此外,“开门编年鉴”既是“开门”迎接批评,也应“开门”宣传、欢迎各界人士在确保年鉴质量的前提下

<sup>①</sup>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9册,第29—47页。

<sup>②</sup>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年8月25日。

<sup>③</sup>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2页。

共同编写,而非局限于一般的约稿。

其次,年鉴编写的时代性要求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这可以从以下2个角度入手:

1. 内容安排。年鉴是对上一年情况的整理汇总,因时而变,一定程度上已经回答了如何实现编写的时代性。但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中却仍显不足,如章目安排常年鲜有变动、个别内容“流水账”等。《申报年鉴》对上年章目、内容的改编则值得借鉴,如1934年《申报年鉴》将1933年“出版”“学术”和“宗教”三章统合为“学术宗教及出版”<sup>①</sup>,“用意在于废除不关重要之独立篇目,合并于性质相类之各篇内,以免重复而便检查”<sup>②</sup>;2. 出版形式。《申报年鉴》分为精装本和普及本,适应了不同读者的需要。在信息化时代,将年鉴分为精装本和普及本的做法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年鉴以纸质出版为主,网络化出版尚未普及。就单个年鉴而言,主办单位可先以部分内容为尝试,或设立专门网页、或与微信公众号相结合、或开发相关手机应用软件,将年鉴分为纸质版和网络版,逐步减少纸质年鉴的发行量与发行内容。这将极大方便读者的查询阅览,有效助力年鉴编写的开放性,也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

最后,“以读者为中心”是年鉴编写的出发点与落脚点。1935年《申报年鉴》出版时,申报年鉴社曾指出:“本年《申报年鉴》新本,已于昨日出版,该书网罗广博,别择精审、约举内容……皆苦心经营,以期此书能有裨补于读者。”<sup>③</sup>苦心经营的目标是希望给读者带来帮助。如今,在编者认真编纂的基础之上,年鉴编写的开放性和时代性相辅相成、相互交融,根本目的亦都是服务读者:前者侧重于年鉴撰修和出版反馈过程,使读者有途径参与年鉴编写、提出自己的建议,后者关注年鉴使用过程,使读者更加便捷高效地查阅信息。

总之,《申报年鉴》(1933—1936)的发行,使读者受益匪浅,为张梓生、申报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现今科研与修志编鉴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冷晓玲 宿万涛

①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3册,第373页。

② 张梓生:《改编经过》,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3册,第370页。

③ 《本年〈申报年鉴〉昨日出版》,《申报》1935年6月3日第3张第10版。